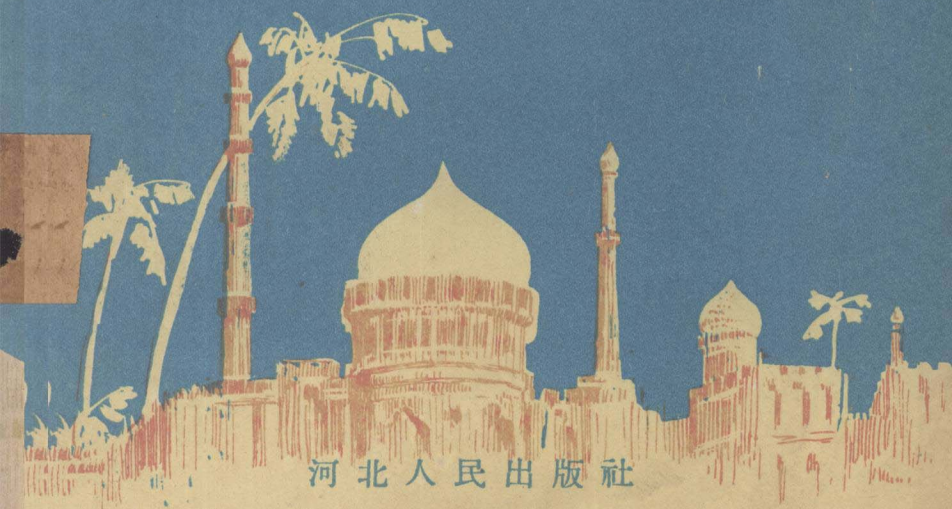


中国和阿拉伯人民的友好关系

南开大学历史系 編



河北人民出版社

中国和阿拉伯人民有着悠久的友好关系。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这种友好关系更有了新的发展。在反对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侵略斗争中，中国和阿拉伯人民结成了坚强的统一战线，相互关怀，相互支援，粉碎了帝国主义企图挑起战争的阴谋，保卫了世界和平。中阿友好合作的关系不断巩固和增强。中国是争取民族独立的阿拉伯人民的真正朋友。

为了反映中国和阿拉伯人民间久已存在的友好关系，增强团结，我们编写了这本小册子。由于我们的水平的限制，错误和疏漏是难免的，诚恳地期待着读者的批评和指教。

南开大学历史系

一九五八年九月

目 录

第一部分 悠久的友好关系

一、“向中国求学”	1
二、阿拉伯文化的东来	11
三、友誼的“宝船”	19

第二部分 友好关系的新頁

一、跃进的中阿友誼	23
二、社会主义国家是阿拉伯人民的真正朋友	42
三、中国和阿拉伯人民心連心	58

第一部分 悠久的友好关系

一、“向中国求学”

两千年前，中国人就知道阿拉伯地方。公元前126年，汉朝的張騫出使西域归来，曾提到西方有个条支国。条支即今伊朗以西，地中海、紅海以东的阿拉伯人所住的地方。公元97年，中国的使臣甘英还曾亲自到过条支。据阿拉伯学者的記載，在公元五世紀的前半期，中国的船只曾溯幼发拉底斯河上航到希拉(Hira)城。因为有了相当密切的接触，所以伊斯兰教的創立者穆罕默德曾經告訴他的門徒們說，应当向中国求学。這句話不仅表示阿拉伯人民知道有中国，而且对中国的学术也頗为贊許。它是中国和阿拉伯人民間的友好关系的預言和象征。

随着伊斯兰教的創立，阿拉伯帝国的兴起，中国和阿拉伯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了。公元651年，阿拉伯国家的使节来到唐朝，这是中、阿两国正式建立国交的开始。从这年到公元798年一百四十八年間，根据中国历史的記載，阿拉伯遣使到唐通好的就有三十五次之多，可見两国外交关系的密切（其中可能有阿拉伯商人以政府使节名义到中国来做生意的）。

由于交往的頻繁，唐朝对于阿拉伯帝国的情况也就有了丰富而正确的知識。当时称阿拉伯为“大食”，这是用波斯人对阿拉伯人的称呼。从唐人对于大食历史的記載中，可以知道当时对于穆罕默德（当时写作摩訶末）的創教，大食帝

国王位的世系，以及奥梅亚王朝（当时称白衣大食）之为阿拔斯王朝（当时称黑衣大食）所代替的过程都有比较正确的叙述（新旧唐书“大食传”）。在当时的世界上，大唐帝国和大食帝国一东一西，是两个最强大和文明富庶的国家，他们间关系的密切，相互的了解，也就是很自然的了。

公元755年，唐朝的边将安禄山举兵作乱，从北方率兵一直攻占了国都长安，这是一个残害人民的叛变行动。唐政府曾邀请大食出兵帮助，讨平了叛军（757年）。其后唐朝由于对付西南方面的吐蕃统治者的入侵，也有人建议联结大食共同防御。这表示两国在政治上的友好关系。

但是使两国关系更为融洽和密切的，还是经济上的往来。中国在唐朝正是封建经济发展和繁荣的时期，而阿拉伯人又是善于经商的民族，因此，在中国各大城市和交通要地，便常有大食商人的足迹。当时从大食到中国来经商，有两条主要的道路：一条是陆路，从大食经伊朗，中亚细亚到新疆，从天山南路或北路东来，经河西走廊而至长安。一条是海路，从波斯湾头出发，经印度洋，绕马来半岛以至广州。由广州沿海岸北上入泉州，或由陆路逾梅岭入江西的南昌，再顺大江以入扬州。从扬州顺大运河北上，经开封、洛阳便到长安。

唐代的国都长安，不但是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也是东亚和西亚的经济和文化交流的中心。在那里汇集着各国的使节、商人、艺术家、传教士以及留学生等。长安的东市和西市，是商业区，各国的商人都来作生意，在这里大食商人也在经常活动着。扬州位于运河入长江的交汇点，当南北交通要冲，商业繁盛，也有不少的大食商人。而大食商人最集中的地区则是广州。因为广州是大食人由海道到中

国的第一个登陆地点，也是他们回国时的发舶之处。据阿拉伯人阿布·赛德·哈散(Abu zaid Hassan)的记载，在第九世纪的七十年代时，该处的大食人、波斯人、犹太人和基督教人竟有十二万之多。即令这个数目有些夸大，但为数一定不少。据阿拉伯商人苏莱曼的记载，中国政府因阿拉伯商人多聚广州，所以任命伊斯兰教长一人，根据伊斯兰教风俗管理他们。这件事使他们非常满意。他们的居留地，以后通称为“蕃坊”，设置蕃长一人管理蕃坊内事务，并为中国政府招徕海外商人来华贸易。这一尊重他们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的措施，充分说明两国间的友好关系。

这些大食商人在中国贩卖象牙、犀角、珠宝、香药等。在唐人小说里记载着他们买卖珠宝的豪富的传说。他们把中国的丝绸、磁器、茶叶等物运到本国去卖。在公元八、九世纪间，黑衣大食的首都，今天的巴格达（唐时译作缚达，宋时译作白达，元时译作报达或八吉打）经常运入中国的货物，并且为这些货物专设一个市场，以备出售。

中国和阿拉伯的商业关系，到第十世纪中叶以后，也就是宋朝的时候，更发达了。因为当时正是中国封建经济高度发展的时期，而宋朝又提倡对外通商。宋朝对外交通，主要是海道。北宋（960—1127）的对外通商港口主要是广州、杭州和明州（浙江鄞县）。到南宋（1127—1279）则泉州地区逐渐重要，最后竟然比广州还要繁盛。在这些港口里，都有阿拉伯商人的踪迹。

这时期出现了不少的大食巨商。如公元993年大食的一个船长（舶主）蒲希密到广州，向宋廷送了許多礼物，中有象牙五十株，乳香一千八百斤。也得到宋朝相当数量的回赠。十一世纪下半期有一个大食商人辛押陀罗，在广州住过

几十年，家資甚富，曾建議自己出錢助修广州城。又如十二世紀后期定居在广州的蒲姓(可能是阿文Abu的对音)更是“富盛甲一时”，豪富为人所艳称(岳珂：“桯史”卷十一)。

这时大食商人在中国贩卖的商品仍和前代差不多，主要是珍宝、犀象、香药等，但数量比以前大得多，其中以香料(即香料和药品)所占的比重最大，而香料则更居首位。当时的香料，名目繁多，如乳香、龙涎香、木香、丁香、檀香、没药、苏合油香，蔷薇水……等不下十余种。它们不但供给统治阶级享受，也可以合成药剂，供一般人民保健卫生之用。同时宋廷又从香料的专卖和海关税收方面，收入不少经费，这对于宋朝的国用，也有不少的补助。尤其在南宋时，对于市舶的收入更为重视，当时奖励对外通商，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由于对华通商的频繁，有些大食商人便久留中国，不再回去。有的就在中国娶妻生子。当时有“土生蕃客”和“五世蕃客”的名称(“宋会要”稿职官四四“市舶司”门)，足见他们在中国久居的情况。南宋末年的蒲寿庚，是大食商人的后代，曾被南宋任命管理泉州的海关事务(提举市舶)，以后又管理福建地方的军政民政和海防的事务。他的哥哥蒲寿晟曾作过梅州的知州，著有“心泉学诗稿”，已经成了中国式的文人了。

因为在华久居，所以他们就建立了永久性的宗教建筑。如著名的广州底怀圣寺，相传是唐时所建，可能是北宋时期的建筑。泉州的清静寺建于1131年。这一切都表示：阿拉伯人到中国来已不仅是临时的过客，而是要作永久的寓公，他们逐渐在中国土地上扎了根，最后就变成有阿拉伯血统的信奉伊斯兰教的中国人了。总之，中阿两国人民的关系到现

在是更为亲密了。

×

×

×

自唐到宋，随着中阿交往的密切，双方都有关于对方的国情的纪录。中国方面，除了正史和其他官方记载以外，还有许多私人著作。现在介绍几种主要的私人著述，以见双方关系之密，相知之深。

中国方面，第一部关于阿拉伯人的著作是杜环的“经行记”。杜环从751年到大食，在那里居住游历了十一、二年，762年由海道回广州。他把在大食游历的见闻写成“经行记”。书中以同情和赞许的态度，对伊斯兰教的教义和教典作了扼要而正确的记录。这是用汉文叙述伊斯兰教的第一部著作。此外书中对大食的物产、风俗，大食的首都及其毗邻各国的情况亦有所记录。“经行记”全书虽然早已遗失，但就现存看来，仍不失为珍贵的材料。杜环可能是第一个居住大食最久而有游记留传下来的中国人。

到宋朝，中国方面关于阿拉伯人的记载更丰富了。除了“宋史”“宋会要”几部重要的官方著作外，私人著述也很多。最重要的如南宋周去非的“岭外代答”和赵汝适的“诸蕃志”。他们对于大食的风土人情，物产地理等方面都有详尽的叙述。对大食的富庶尤其称道。如“岭外代答”说：“诸蕃国之富盛多宝物者，莫如大食国。”“诸蕃志”说大食“其国雄壮，其地广袤。民俗侈丽，甲于诸蕃”。同书对埃及的情况（称为勿斯里，即阿拉伯人对埃及称呼的misr）也有一些介绍。

在阿拉伯方面，也有许多关于中国的记载。最重要的如阿拉伯商人苏莱曼(Suleiman)的游记（完成于851年）。苏莱曼曾到印度、中国诸地经商，他的书中对于从阿拉伯到中

国的海道航程記載相当詳实。書中提到广州（称为Khanfu）的阿拉伯人居住情况，贊揚中国的行政措施，說到中国吃茶的习惯。这是西方旅行家提到茶叶的第一次。阿拉伯文茶叶就是中国茶的譯音（原書作Sakh今通作Shai）。

第二个重要的阿文著作是阿布·賽德·哈散（Abu zaid Hassan）的記錄。哈散未到过中国，但是根据其他到过中国的阿拉伯人的叙述，所以也很亲切。書作于916年，曾提到黄巢起义的事。又記錄了作者的朋友伊本·瓦哈卜（Ibn wahab）到长安（称为Khundān）和唐朝皇帝作的关于世界历史和宗教情况的长篇談話。瓦哈卜对于长安城市的描写和唐代长安实际的情况差不多，所以他見唐朝皇帝的事情可能是真实的，虽然在中国史書上找不到印証。

阿拉伯文关于中国記載最詳尽的应当推麻素提（mas'ūdi）的“黄金草原”一書。麻氏是中世紀阿拉伯人著名的历史家、地理家和旅行家。他曾到过印度和中国。他的書篇幅甚大，共132章，完成于947年。是一部世界历史和地理的著作，有多处提到中国，而且有一章（第十五章）专講中国。他对中国备极推崇，称道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秩序，人民的富庶。对中国人的技巧尤其贊揚。他說“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特別长于塑象及其他技艺，在工艺造作方面世界上沒有那一个民族能比得上他們”（据英譯本）。

此外还有一些阿拉伯人地理和游記書中講到中国，就不一一介紹了。从以上这些介紹里面我們可以得到一个印象，就是：無論中国方面或阿拉伯方面，对于对方的描述都是贊揚和推崇的，这正表現了两国人民的互相尊重的友好关系。

× × ×

經過了长期的密切的接触，两国都从对方取得了不少有

用的东西，無論在經濟方面或文化方面。

从中国方面看，这个时期，阿拉伯人贩运进来的东西，有很多有价值的物品。特别是香药方面，給中国药理学增加了許多新的方剂，扩大了中国人的药理学知識；对中国人民的保健卫生方面，也有很大的作用。阿拉伯人贩运进来的藥物，如蘆薈，血竭，阿魏，肭肭臍（海狗腎）等，都是名貴的藥品。而香料方面，也有不少可以作为药剂。如苏合香油，“諸蕃志”說它“出大食国……番人多用以涂身，閩人患大风亦仿之。可合軟香及入医用。”又“苏沈良方”卷五提到“苏合香丸”的功效能“安气血，却外邪。凡疾自内作，不曉其名著，服此往往得效。”并举一病例說：“有一船工之子病伤寒，日久而死，但心窩尚暖，不忍不与药，藥而不救。試与苏合香丸灌之，四丸乃省，遂瘳。”“洪氏集驗方”卷一說：“肉豆蔻散，治赤白痢无药可治者，其效如神。上吐下痢者亦治。”此外宋人藥物書上所記以香料作丸、散或湯剂者甚多，如乳香丸，乳香散、乳香丹、木香丸、木香湯、丁香豆蔻散……等不下二三百种。

黑衣大食首都巴格达学者納的木(Abu'l-Faraj ibn Abū Ya'qub al-Nadīm 死于995年)所撰“群書总目”中提到名医拉齐(muhammad ibn Zakariya al-Rāzi 850—925)和一个在巴格达游学的中国医生的故事。說那个中国医生在离开該城时，曾要求拉齐把古希腊医学家盖倫諾(Galenos)的十六卷医学著作的阿拉伯人譯本向他口授，由他笔录下来(引自李約瑟 Needham的“中国科学与文明史”第一卷219頁)。这个故事虽然无从用中文材料証明，但可能性很大。因为当时交通方便，中国人可能到那里去。这件事表明了中国医学家肯虛心向阿拉伯人学习，也是两国文化交流的一个具体

例証。

石油是阿拉伯、伊拉克諸处的产物。阿拉伯人早就把它用之于战争，八、九世纪以来特别发达。中国虽自两汉以来就知道石油，但没有把它用之于战争。从唐宋五代以来，中国方面才把它用于军事上，称之为“火油”或“猛火油”。最先是由南方的吴越国（893—978）和吴国（892—937）应用，曾传到北方的契丹。記載上說“火油得之海南大食国，以铁筒发之，水沃，其焰弥盛”（吴越备史卷二）足見是从大食傳來。宋朝猛火油也用于战争。軍器监中有猛火油制作厂。西北边防要地也掘大池蓄猛火油以燒敌人营垒（康与之“昨梦录”）。

阿拉伯人所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也值得称道。首先，中国的造纸术从751年以后从中亚传到阿拉伯本土，以后逐渐传入埃及、西班牙和欧洲。造纸术的传入，帮助了阿拉伯人的繕写和流通。对于阿拉伯人和欧洲人文化的发达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根据杜环的“經行紀”，八世纪下半期他在大食时，看見許多中国工匠在那里，如画匠，金銀匠，紡織匠等。这就是說在751年后，除了造纸术以外，还有其他的手工艺技术传到阿拉伯去。

上面提到中国医学方面受到的阿拉伯人的影响。在这个时期里，阿拉伯人的医学也受到中国的影响。最著名的阿拉伯医学家阿維森納（Avicenna 979—1037）的“医經”中，有一部分講到診脉，其診脉的方法和中国的相同。又論脉有浮、沈，强、弱等說法，也和中国医書相同。这当然是从中国学去的。

瓷器是中国人发明，也是輸入阿拉伯的重要的貨物。阿

拉伯人对它非常喜爱。由于珍视中国的瓷器，就引起了阿拉伯人的仿制兴趣，而他們的仿制确頗有成就。最初还只是对中国器物的顏色、紋理、式样的摹仿，以后就独出心裁，有了新花样。他們用不透明的錫粉作釉制出一种白色来，这一成就为瓷器的着色开辟了新的途徑。巴格达遂成为伊斯兰世界精美陶瓷生产的中心。这是九世紀的事情。到了第十世紀后期，埃及的法特米王朝(Fatimid 969—1171年)的工人也仿造中国瓷器。十一世紀时开罗的制瓷业也很著名了。阿拉伯人称瓷器为綏尼(Sini)即中国的或中国人之意，这可以說是对于中国傳来的东西的紀念。

中国的絲織品早就輸入阿拉伯，到宋代輸入更多。由于泉州的地位逐漸重要，从泉州輸出的絲織品也特別多。泉州从五代时通称为刺桐城，阿拉伯商人也用刺桐(Zaytun或Zaitun)这一名称称泉州。同时就把緞料称为刺桐的(Zaytuni或Zaituni)表示其来源。这一名詞傳到欧洲去，至今英法及其他欧洲文字也称緞料为——Satin或类似之字。它的来源都出于阿拉伯文，这和瓷器、茶叶一样，都是两国經濟交流的紀念品。

中国至迟在十一世紀末年已經把指南針应用于航海事业(指南針的創造当然更在以前)。阿拉伯文献提到指南針的則在十三世紀之初。两宋时代，阿拉伯商人到中国通商的很多，中国船只也常航行在南洋、印度一带。因此阿拉伯商人从中国学得了使用指南針的方法是很可能的。

印刷术是中国最先发明以后又傳到世界各地的。阿拉伯人的印刷术也是傳自中国，虽然具体的輸入時間和途徑还不能完全肯定。1880年在埃及的发雍(El—Fayyâm)地方，发掘出来大批文件，其中有五十張左右的印刷品，均为阿拉伯

文，包括古兰經殘卷和其他宗教性文件。据西方学者考証，这些印刷物的年代，大概上起公元900年直到1350年，印刷品的形式和印刷的方法都和中国的印刷品相似。无疑是学自中国的。假定以为唐末傳入太早的話，那么在宋元时代中国印刷术傳入阿拉伯是无可怀疑的了。

和印刷术一样，火药也是从中国傳入阿拉伯然后傳到欧洲的。火药最重要的原料之一硝石，大約八、九世紀期間傳入了阿拉伯，阿拉伯人把它称为中国雪。医生們用以治病，炼丹家用來制仙丹，炼金銀（順便提一下，阿拉伯的炼丹术也是在八、九世紀从中国傳入的），工人用以制琉璃，但还不知道用来造火药。因为中国当时还没有把火药用在軍事上。十世紀时，中国軍事家开始把火药用于軍事上，十世紀火药这个名詞也确定了。1044年宋朝編的“武經总要”上，列着三个制造火药的方子，以后屡有改进，并把火药用在各种火器上以射击敌人。十二、三世紀时（也就是南宋时），阿拉伯的商人从中国把火药和烟火帶到阿拉伯去，从此阿拉伯便会制造火药和烟火。但还不能制造火器。十三世紀以后，随着蒙古人的西侵，中国的火器也就傳到阿拉伯去。从此阿拉伯的兵書里便有“契丹火箭”（Sahn—xatai）这一名称。“契丹”是元代西域人对北方中国的名称，足見阿拉伯火器之得自中国。以后阿拉伯人更进一步改进火器的构造和应用。再后又把它們傳到欧洲去，欧洲人才会制造和使用火器。

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針和火药，这是中国人对于世界文化的卓越貢獻。在傳播这些創造发明給西方世界过程中，阿拉伯人起了主要的作用。这是我們两国人民的光荣和驕傲，也是我們两国文化交流的珍貴的紀念。

在結束这段历史之前，讓我們举一个九世紀来中国的阿

拉伯留学生的故事，来说明中阿的文化关系和友谊关系。在847年，有一个大食人李彦升来到长安，第二年他参加唐朝举行的国家考试（科举），考取了进士。在唐朝进士是很难考取的，这一年才录取了二十二个人，李彦升以外国人竟然得第，这真是难得的事。因此轰动一时，有人竟说为什么荐举一个外国人来应考。但有人公正地认为，彦升虽然是外国人，但爱好中国文化，荐举和考取都是应当的。因此有人作了一篇题为“华心”的文章，来纪念此事。“华心”的意思是说，彦升虽然外貌是外国人，内心却倾慕中国。李彦升是个汉名，他应该还有阿拉伯本名。他一定是来华较久，对中国学问下了一番工夫，而且有相当造就，才能应进士的考试。他这一举动，很符合穆罕默德劝他门徒到中国求学的指示。这真是中阿早期关系史上的一段佳话。

二、阿拉伯文化的东来

蒙古人兴起和元朝统治中国时期（1279——1368）中国和阿拉伯的关系更进一步密切了。

蒙古统治者曾侵入中亚、西亚及其他各地，并征服了全中国。阿拉伯和中国都遭受了很大的破坏和损失，这对两国人民来说都是不幸的。但另一方面，由于中西交通比以前更加方便，两国人民的接触较以前还要密切，两国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也更为频繁了。这当然不是蒙古统治者所意料到的。

在这一时期，住在中亚和西亚的西域人（元朝称之为色目人或回回人）大批的到中国来，其中有不少的阿拉伯人。他们有的是被蒙古统治者强迫迁移来的，有的则是到中国来经商。他们之中有军人，也有文人，有科学家，也有工人、商人、医生和传教士。他们来的数量之多超过了任何一个朝

代，而且絕大部分都是定居在中國，最後成為中華民族的一個組成部分。他們帶來了許多有用的科學技術，也學習了不少的中國學術，這對於中國文化的發展都有一定的影響。

蒙古人在侵略和征服西域諸國的过程中，曾俘虜和收納了不少的西域人，把他們帶到東方來。同時，為了統治中國，蒙古統治者又有意地對其中一小部分人給以官職，使他們幫助他對中國進行統治。但對其中大部分人民則仍施以壓迫和剝削，僅是為了分化他們同中國人民的关系，在待遇上與中國人稍有不同而已。統治者這一惡毒政策，雖然收到某些效果，但總起來看，它並沒有能阻擋中阿兩國人民的親密关系，反而使兩國人民更加接近了。

當時來華的阿拉伯人，不但數量很多，而且散布到中國各地，不象以前僅僅集中在幾個通商港口或重要城市。周密の“癸辛雜識”說：“今回回皆以中原為家，江南尤多”

（續集上）此處的回回系指信奉伊斯蘭教的西域人而言，其中阿拉伯人當亦不少。明史“默德那傳”說：“迄元世，其人遍于四方，皆守教（伊斯蘭教）不替”。（卷三三二西域傳）元時來中國的意大利人馬可波羅在其游記中提到中國各省都有伊斯蘭教徒。這都可以作為阿拉伯人在中國分布情況的概括說明。具體的例証很多，略舉一二：如賽典赤·瞻思丁是穆罕默德的后裔，他在雲南作官，他的子孫也大都留在雲南；至今雲南有些回族還是他的后代。波斯人拉施特丁的“史集”中也提到雲南伊斯蘭教徒很多。又如大食人瞻思的祖父因在河北真定作官，便真定安家（元史190）。這是邊疆和內地的情況。至于通商口岸，如泉州和杭州，那就比以前還多了。看阿拉伯人“伊本·白圖泰（或譯拔都他1304——1377）”的游記所記兩地的情況就可以知道。由于

蒙古統治者在全国各处都用色目人作官，因此他們之散布全国便是很自然的事。至于商人，也是散布很广。許有壬作的“西域使者哈只哈心碑”上提到当时西域商人在中国是“擅水陆利，天下名城巨邑，必居其津要，专其膏腴”（“至正集”卷53）足見阿拉伯商人遍于各地。

这些来华的阿拉伯人，傳入了不少的科学技术。首先是天文历法。中世紀时阿拉伯人对天文学非常重视，也有很大的成績。这时期有不少的天文历法家到中国来。最著名的如札馬魯（刺）丁，在1267年（元世祖至元四年）制成万年历（又称回回历），曾行用过一些时候，同年他又在北京創制了七种观测天象的天文仪器，其中有一种称为“苦来亦阿兒子”（Kurah—i—arz）当时譯为地理志，其实就是地球仪。它的制法是“以木为圓毬，七分为水，其色綠；三分为土地，其色白。画江河湖海脉絡貫串于其中。画作小方井，以計幅圓之广袤，道里之远近。”（元史卷四十八“天文志”）这就是承認地为球形，同时对水陆分布情况也相当正确，当时世界各国的形势，大概也画在球上。这就打破了天圓地方的陈旧觀念，給中国人以正确的天文和地理知識。

元朝曾設立“回回司天監”，以观察天象，制定历法。第一个天文官就是札馬魯丁。終元一代，回回司天監与汉人司天監并存。万年历据“元史历志”上說在1281年頒布了郭守敬的授时历以后就“不复傳”了（元史卷五十二），实际上并不然。因为在1313年又有一个叫可里馬丁的（当亦系阿拉伯人）上其所編万年历（元史卷二十四皇庆二年十二月条紀事），可証回回历法并没有廢除。到明朝仍然設置回回司天監，而且翻譯历書（明史卷三十一历志）。足見阿拉伯天文历法之为人所重視。

在元朝所設立的“秘書監”（管理圖籍的機構）里，保存着許多“回回書籍”，其中有阿拉伯的天文曆法等書。如有“麥者思的造司天儀式十五部”，“麥者思的”是阿拉伯人對埃及人拖雷美（Ptolemy）的天文集“Almagest”的名稱，“造司天儀式”是元時譯名。又有“積尺諸家曆四十八部”，“積尺”是阿拉伯文“zij”或“zidj”的對音，譯意是天文曆表，“諸家曆”是當時的譯名（據1955年7月7日光明日報，馬堅所著“元秘書監志回回書籍釋義”一文）。

同天文曆法有關的阿拉伯數學，這時也傳入了。上引秘書監里的“回回書籍”中也有一些數學書籍，如有“呵些比牙諸般算法八部”，“呵些必牙”是阿文Hisabiya的對音，譯意是算學。“諸般算法”是當時的譯名。

1956年冬在陝西西安東北角元代安西王舊址發現三個同樣的阿拉伯數碼字鉄版，數學家考知是一個“六六縱橫圖”，這可能是從阿拉伯傳入或在中国的阿拉伯數學家製造的（1958年第七期文物參考資料，李儼“阿拉伯輸入的縱橫圖”）。

阿拉伯的醫學也傳入了。元朝曾設立醫學機構，稱“廣惠司”其職掌即制作“回回藥物”。另在大都（北京）和上都（多倫）設立了兩個“回回藥病院”（元史卷八十八）。他們的醫術很受人民的歡迎。據說有個小孩患頭痛病，一個回回醫生在他的額上開刀，取出一個堅硬如石的小螃蟹，疼就止了（“輟耕錄”卷二十二“西域奇術”條）。他們有很多在民間營業，為人民治病。元人王沂作的一首“老胡賣藥歌”上說：

西域賈胡年八十，一生技能人不及。

神農百草舊知名，久客江南是鄉邑。